

平坝保卫战——

巩固发展鄂中根据地的关键战斗

■张磊 胡振芳

1940年6月,日军相继占领襄樊、宜昌等地。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精神,并结合战争形势变化,决定由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主力向襄河以西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以牵制日军,并配合鄂西北友军作战。豫鄂挺进纵队主力挥戈西进,登陆西北白兆山地区,进一步开辟鄂中敌后抗日根据地。7月至10月间,为保卫平坝地区不被敌军侵占,豫鄂挺进纵队先后3次与日军展开战斗,取得“平坝三捷”的战绩,挫败了日军占领平坝的企图。

收复平坝,清除根据地扩大障碍

平坝镇位于湖北京山、安陆、随县交界处,北连白兆山,西接大洪山,是联系鄂中广大山区的枢纽和通往鄂中各县的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入侵湖北后,立即在平坝镇建立据点,后因兵力不足,将此据点交给伪军看守。

1940年6月,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率豫鄂挺进纵队平汉支队第1、第2团队西进至平坝。6月20日,平汉支队第1团队和第2团队分别从西北面和东南面将平坝团团包围,截断进镇的水源,并展开政治攻势。然而,伪军妄图凭借平坝坚固的石墙负隅顽抗。意识到和平解决已无可能,我军决定对平坝镇守敌发起进攻。

21日晚,平汉支队队长周志坚带领第1团队在镇西佯攻,将大批伪军吸引到西门。负责主攻的第2团队趁机向东门发起猛攻。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一举攀上城墙,占领东门,随后冲进城内展开巷战。战斗不到1小时即胜利结束。此次战斗,我军成功收复平坝,歼伪军一部,控制了安(陆)京(山)随(县)枢纽地带,清除了大山头与白兆山之间的障碍,切断了安陆日军与三阳店、宋河、应城日军之间的联系,对雷公店、三阳店等附近日军据点形成威胁。战后,豫鄂挺进纵队的首脑机关,移驻至白兆山九口堰孙家大湾。



位于湖北省京山市新市街道八字门村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旧址。

资料照片

一保平坝,迁敌侧后打退敌军进攻

平坝镇被我军收复后,引起四围敌据点日军的不安。豫鄂挺进纵队机关多次向各部强调,日军不会轻易放弃这一重镇,势必卷土重来,各部要保持高度警惕,充分做好战斗准备,坚决打击来犯之敌。

果不其然,7月初的一天,日军纠集第3师团2个大队约1200余人,从安陆县城向雷公店集中,携带重设据点的铁丝网等器材,沿着已被我军破坏的公路,向平坝搜索前进。平汉支队获悉情报后,迅速进行战斗部署。

当晚,周志坚带领平汉支队第1团队的第1、第2大队和第2团队的第2大队,在敌军必经的公路上设伏。翌日清晨,当日军进至距平坝三四公里处时,埋伏在公路两侧山头上的战士立即发起攻击。日军慌忙后撤,占领公路两侧的制高点 and 附近村寨顽抗。战斗中,平汉支队连续打退日军5次反扑。当日军窜至平坝附近时,又遭从云梦、孝感方

向赶来的平汉支队第1团队第3大队的截击。双方由上午战至黄昏,日军战败退回雷公店据点。此战,我军共歼灭日军100余人。

二保平坝,合力夹击打破敌军偷袭

9月,不甘失败的日军出动600余人,再次向平坝进犯。此次进攻,日军采取偷袭战术。当天拂晓,日军在雷公店秘密集结步兵、骑兵后,分路走小道隐蔽前进。平汉支队接到群众报告,随即令第1团队一部迎击敌人,并急调驻杨家湾的第3团队回援。

战斗从中午开始,第1团队占据制高点,进行顽强阻击,使敌军数次进攻均未得逞。随后,日军向王义店方向撤退。撤退途中,日军又遭我第3团队截击。敌发起多次冲锋均被我第3团队击退。不久,我第1团队等部队赶来增援,形成对敌夹击之势。战至傍晚,日军由于腹背受敌,渐渐不支,不得不从侧面夺得一条退路,拖着一些尸体逃回安陆县城。

银牌守月卫国邦

——中国古代卫体兵器之盾(下篇)

■曹波

使用椭圆盾的传统。膝排和团排在五代时期仍被使用。

宋朝时期,步兵和骑兵的盾称为旁牌。旁牌以坚木制成胎骨,牌面蒙有皮革。步兵旁牌长可蔽人,平底尖首,中间起脊,背面安有铁木,可将牌立于地,以防敌军弓矢砲石的密集攻击。骑兵旁牌呈圆形,面积较小,正面绘虎头,背面套环。作战时,骑兵可将旁牌套在左臂上以抵御飞鸟。可以看出,这两种旁牌的形制和用法多承袭唐制。据《武经总要》记载,宋朝在城防装备方面进行重要创新,特别是研制出两种大型盾牌。其中一种立盾规格为高五尺(约154厘米)、阔三尺(约92厘米),是专为守城作战设计的大型防御装备。这种新型盾牌的出现,也从装备发展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态势。

辽、金、西夏乃至元朝时期的盾,在材质运用和细节设计上融入鲜明的民族特色。以西夏军队装备的毡盾为例,其创新性地采用毛毡覆盖盾面的工艺,不仅提升了防御性能,还兼具良好的机动性,在野战和攻城守城作战中均得到广泛应用。元朝时期,元世祖忽必烈组织工匠研制出可折叠盾牌,这种盾牌展开时可用于防御,行军时则可折叠携带,体现出游牧民族注重实用性的装备发展理念。

明朝时期的盾,多注重与其他兵器的配合使用。比如,藤盾不仅能与刀枪等冷兵器配合使用,还可与鸟铳、三眼火铳等火器相配合进行协同作战,从而提升作战效果。最具明朝特色的当属那些集防御与攻击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盾,它们有的内置火器,有的暗藏弓箭,使盾在战斗中作用发挥更多样化。

三保平坝,巧妙设伏粉碎敌军突袭

10月,连续两次在平坝损兵折将、恼羞成怒的日军,对平坝发起更大规模的第三次进攻。驻扎在三阳店的日军第3师团,纠集步、骑兵近千人,为迷惑我军,故意于深夜从三阳店出动,佯装沿宋河公路南下,中途突然离开公路向平坝扑来。获悉情况后,刚刚换防至此地的豫鄂挺进纵队第6团队,在团首长率领下,于当日3时进入漳河以东阵地埋伏。等了几个钟头,敌人还没有进入伏击圈。原来,狡猾的敌人到达平坝附近又折转向南。于是,团首长立即命令部队秘密运动接敌。这时天已大亮,日军尚未发现我军动向。经过一夜行军的敌人疲惫不堪,原地休息。我军趁机以山谷作掩护加速前进超越日军,在距离日军1公里处迅速翻上山梁,占据有利地形埋伏。

8时许,敌军进至平坝附近的崔家冲,进入我伏击圈。战士们随即依托地势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第3团队一部亦参加了此次战斗。日军猝不及防,遭到严重杀伤。随后,日军重整兵力,以密集炮火向我军发起疯狂反扑,又遭到我军猛烈阻击,抢占高点始终未果。三阳店日军一部出发支援,见战局不利,中途折返。战至当日17时,我军共歼灭敌军100余人。日军残敌向应城溃逃,沿途丢弃尸体和枪械弹药。

豫鄂挺进纵队在3次平坝保卫战中,共毙伤日军400余人,缴获战马10余匹以及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品。由于指战员英勇机智,一再挫败日军进攻,从而牢固控制了鄂中山区交通枢纽平坝镇,保障了白兆山的南方门户,便利了纵队与大山头等根据地的联系,使白兆山与大山头、八字门等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块比较稳定的根据地。

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

“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保护、教育新中国的后代。”1938年9月25日,《新中华报》特别开辟专刊,介绍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的经过,这句话就刊登在专刊的右侧版面上。同一版面还刊载了毛泽东同志为保育院的题词“儿童万岁”。这些都体现着我党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为抗日将士子女、烈士遗孤及战区难童创建了多所保育院、托儿所。这些机构被称为延安保育院。在我党的关心和领导下,从事保育工作的教职员为养育和培养革命后代呕心沥血、艰苦奋斗,谱写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光辉历史。

1937年初,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3月,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延安托儿所正式成立,开始接收将士子女和烈士遗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无数抗日志士奔赴前线,将年幼的子女留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解决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培养国家民族的未来,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决定在延安托儿所的基础上,扩建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即延安第一保育院)。

1938年10月,延安第一保育院正式成立。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开来,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很快,第一保育院里就充满孩子们的欢歌笑语。自成立起,第一保育院便汇聚着八方关爱。中央与边区领导人频频探望,边区政府优先拨款,社会仁人纷纷解囊。在他们的关怀下,第一保育院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包含乳儿部、婴儿部、幼稚部、小学部的完整保育教育体系。1940年春,随着延安本地儿童的看护需求不断增多,中央在距离杨家岭很近的兰家坪山上,又建起延安中央托儿所。

延安的保育机构实行全部免费的学前教育,为孩子们提供较优渥的饮食、居住、卫生、文化活动条件。即便在1942年国民党实施经济封锁,边区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时刻,也保证孩子们有足够的营养。通过各界支持与生产自救,乳品、面食、粉条、豆腐等不断供应到孩子们的餐桌上,使儿童享有战时的“最高待遇”。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保育工作的政策,确立了“增进儿童知识,训练头脑并用,使之成为未来新中国健全的主人”等教育方针。第一保育院小学部的生产劳动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孩子们在实践中成长,在汗水中收获知识与勇气。

1944年秋,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干部的子女、从后方辗转来延安的烈士子女大量增加,原有的保育机构已难以满足需求,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1945年6月,延安第二保育院在延安城北枣园附近的小砭沟建成。

当时的延安,已经拥有3家保育机构,从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到七八岁的儿童,都在保育范围。越来越多的革命后代和边区儿童来到这些温暖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红军到达延安至抗战胜利,延安保育院先后接收近3000名婴幼儿,极大解决了抗日将士、党政干部的后顾之忧,为革命花圃培育出大批茁壮的幼苗,成为我党“红色摇篮”。

抗日战争胜利后,来之不易的和平很快又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在战火随时可能蔓延至延安的紧急情况下,党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一律撤到更安全的地方去,撤离名单中就包含这几所保育机构。撤离前,延安保育院的工作人员

战火中的『红色摇篮』

■陈健 李孟远

员反复训练孩子躲避危险,自我保护的技能,并赶制可放在马、驴或骡子背上的儿童驮床,加紧准备衣物、食品、药物、骡马等。11月5日,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主任康克清到第二保育院传达党中央的撤离指示,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发出“大人在,孩子在,大人在不在,孩子也要在”的铿锵誓言。至1947年初,延安第二保育院、中央托儿所、第一保育院先后撤出延安,开启辗转千里的“娃娃长征”。

转移之路崎岖难行、险象环生。每个保育员要照顾三四名孩子,队伍既要抵御疟疾、疥疮、腮腺炎等疾病甚至狼群侵袭,又要防范敌人威胁,时刻注意隐蔽。保育、医务及警卫人员不畏寒暑、公而忘私,夜以继日守护着孩子们,为保护儿童而受伤者不可胜数。敌机轰鸣时,保育员们屡屡奋不顾身,以血肉之躯筑起护佑屏障;山路险峻处,工作人员通力合作,冒着生命危险拉回临崖落空的骡子及驮床。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行军,这3支队伍相继安全到达解放区。延安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保护孩子们的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在不在,孩子也要在”的誓言,创造了数千里行军没有一个孩子掉队,没有一个孩子伤亡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保育院分别落脚北京、西安和延安三地,中央托儿所和第二保育院则跟随党中央到了北京。从此,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远离战争的硝烟,在和平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因为亲身体验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及胜利的来之不易,长大后的他们,时刻把延安精神融入血脉,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唐朝时期的陶画彩持盾武士俑。

资料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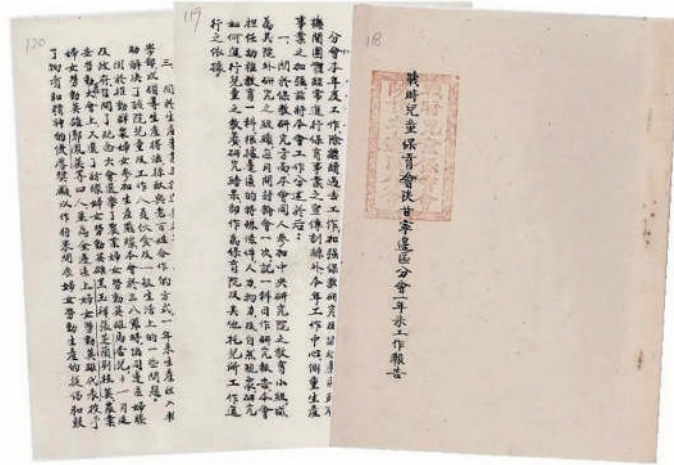
明朝时期的虎头牌(模型)。

资料照片



《兵技指掌图说》中的清军藤牌兵。

资料照片



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一九四三年工作报告(部分)。

资料照片



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大门。

资料照片



保育员为孩子们缝被褥。

资料照片